



姨娘

石泽丰

姨娘走了,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。大雨下了整整一夜,母亲哭了整整一夜。

姨娘在她兄妹之间排行老五,比我母亲小七岁。春节之后,她感觉身体不适,去省立医院一检查,肺癌晚期,一纸诊断书宣判了她的死刑。医生说,她最多只能活3个月。果真如此,不到3个月,姨娘就离开了人世,离开了我们。这一年,她68岁。

我回家吊丧,路过姨娘家的芝麻地。素白的芝麻花齐刷刷地开着,在雨中,朵朵低着头,仿佛也在为姨娘默哀。与我同行的表姐桃红说:这芝麻就是姨娘和姨父种的。她们和所有农村留守的老人一样,省吃俭用,与土地为伍,竭尽全力耕种作物,在收获之季,他们躬身收割、脱粒,让五谷杂粮颗粒归仓。与周边地里的芝麻相比,他们种的芝麻比别人家的长势明显高上一等。姨娘等不到收割了,她把这一摊子事交给后人,她不管了。

上次回去,我就听说姨娘得了重症,大伙儿都没有向她说出真相,包括她的子女,怕她背负太大的思想压力,毕竟这是直面死亡的话题。我去看她时,她正坐在堂屋的饭桌边,身体虚弱。见我来了,她努力地站起身来,整个人有气无力。她执意要去里屋,为我捡些土鸡蛋和山羊粉。我鼻子一酸,强忍着泪水,把六百块钱塞到她的手里。

姨娘家与我的老家只隔着一条小河,河上架有一座桥,名曰:红卫桥。早年,红卫桥的两头散落着商铺、肉铺、铁匠铺等,热闹非凡,周边十来户人家的人总爱来这里购物、闲扯,我们小孩也爱去那里凑热闹。记得我8岁那年夏天,有一次,我在红卫桥上遇见了我的表哥(我姨娘的儿子),我说我想吃糖果。我原以为他会给我买,因为他比我大6岁,哪知表哥有些不好意思,他说没有带钱。是呀,那个年代,孩子身上哪有钱呢。第二天,姨娘便拎着一袋糖果来我家看我了,我不在家。听奶奶说,表哥回去把这事跟姨娘说了,她走时反复叮嘱:不能让我到桥上去玩,水深危险。

姨娘把我看得很重,逢年过节她总要为我送些可食之物,有时还带来一两双“千层底”的布鞋。布鞋是姨娘亲手做的,她把平时收集起来的碎布,在那些寂静的夜晚,层层叠起,每层都敷有糨糊粘连,然后用针线密密穿凿。我见过她纳鞋底时的情景,她手上的线随着针,针在顶针的助力下,把线从鞋底的一面引领至鞋底的另一面。每一次穿凿之后,她都要用右手的小拇指绕着引过来的线,用力带紧,方又从这一面重穿到另一面。过去返回来,返回来再过去,如此反复,经过一两个夜晚的穿凿,鞋底被一圈圈排列的数百个针眼扎得结实。这些细致的针线活,形成了鞋的式样,姨娘生活的式样。她把爱深深地扎在其中,然后送给我,让我的双脚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温度,且暖至心窝,难以忘记。

我站在姨娘的灵位前,昔日的情景再一次在脑海里翻转。姨娘的遗像摆在桌子中间,她的微笑凝固成了永恒,目光洒向相框外的世界。现场所有的人,只有她,没有丝毫的悲戚。我向她三鞠躬,然后跪拜,起身之时,突然发现她棺材前点着的油灯边,摆着一双崭新的“千层底”,上面绣有几朵小小的芝麻花。姨父说,那是多年前姨娘为自己后事准备着的,一直放在她陪嫁的木箱里。如今摆出来,上面的花儿依旧那么鲜艳。

当年,姨娘是八抬的大桥抬进姨父家的,时间一晃,几十年过去了。如今,八人龙杠却将她抬出了姨娘家,鞭炮炸得急促,噼噼啪啪,在旌幡的引路下,她被抬进了墓穴。这中间,仿佛只有一个小小的停顿。看着姨娘被放入墓穴,一铲一铲的黄土埋下去。恍惚中我看见一朵又一朵素白的芝麻花又开了在她的周围,微风吹来,它们仰着脸,为我的姨娘,指引着天堂的方向。

警察的温度

曹放

说实话,大学毕业之初,青春壮志,梦想飞扬,可是却未设想当警察。或许是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,总之当警察是离我很遥远的事儿。直到招警考试结束前的一小时,我才在父母的“包办”和“倡导”下报名参加考试,继续攻读二学位。后来的一次“冒充”警察,让我感受到了警察是有温度的,警察这个职业也最终成为我今生无怨无悔的选择。

2011年冬天,警院放寒假。一天夜里,我送下晚自习的媳妇回了家,独自返回住处。路上,猛地从背后跑过来一个小姑娘,拽着我的衣服喊救命,才发现后面是一个醉酒的大汉,瞪着一双迷离的醉眼,尾随了小姑娘一路,意图不轨。我本能地冲他大喝一声:“我是警察!别动!”谁知那个大汉真的不敢动了,愣了一下之后扭头走了。小姑娘惊魂未定,慌乱中说了声:“哥,谢谢你,你这招真厉害!”说完就跑进了一个小区。我心想,我可没骗人,现在是“准警察”,半年之后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警察了。正是那一次“英雄救美”,使我真正体会到了警察职业的荣耀和自豪,似乎又觉得很庆幸选择了当警察。

光阴似箭,岁月如梭。转眼入警已八年多了。这期间,我的工作经历了刑侦、办公室和派出所的大“跨界”。无论在哪个岗位,我都牢记使命,尽职尽责,尽心尽力,自我加压,追求卓越,圆满完成了又一个又一个工作任务。同时,我也深切地认识到了警察的含义:一个“警”字,上面是“敬”,下面是“言”,这就要求一名警察,既敬畏法律,言出必行;又敬畏人民,言之有情。

2019年11月,我初到农村基层派出所工作,任政治指导员,如何得到群众的认可,赢得群众的信任,是组织对我的一次大考。到派出所报到的第一天,接到了媳妇发来的微信:“老公,相信自己,你到了哪里也是我和儿子的超级英雄!”妻子的话使我瞬间泪目,动力倍增。

今年3月份的一天深夜,我刚刚把一名受伤的村民送到区医院包扎,回来的路上又接到了报警电话。电话那头是一中年妇女惊恐的呼喊,问清了大致情况和地点,一脚油门踩到底,捷达车顿时带着推背感赶往事发村庄。

原来,这名妇女早年离异,其子刘某当晚喝了酒,借着酒劲儿劝其母亲复婚,其母不从,刘某在家里大闹起来。起初刘某并不配合,我们只好带回派出所约束,刘某对其母亲报警抓他的事情更加耿耿于怀。闻讯赶来派出所的还有刘某的几位亲戚和村干部,经过了解才知道,刘某平时又能干,又孝顺,可一喝了酒,就变成了“天老大他老二”的主,这喝酒激动母子吵架八成与其母亲有关。

我突然联想到,媳妇之前提到过心理健康中的“原生家庭”,刘某8岁时父母就离了婚,自幼缺乏鼓励和关爱,其性格无常也是“原生家庭”使然。刘某成年之后吃苦肯干,日子过得还不错,多次要求母亲和父亲复婚未果,这才激起了他的情绪。

酝酿了片刻,我赶到询问室,尝试着跟刘某沟通:“小伙子,我知道你从小不容易,现在干得不赖啊,也挺孝顺,对你父亲、奶奶都不错……”

话还没讲完,刘某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:“你别说了,你别说了哥……”我递过一张纸巾,走到他跟前听他倾诉,经过沟通,刘某对晚上的事情也释怀了,不再干涉父母婚姻。回家前,刘某拉着我的手说:“我都听你的,好好混,憋不住了我来找你喝酒!”

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了当老师的媳妇听,“这几年没白帮你写教案,谁知道这里还有方法能解决矛盾哩。”媳妇说道:“方法是一回事,这个主要是你感同身受地为他想了。”

确实,人心都是肉长的,只要与老百姓能够感同身受,让他觉得你的工作与他有关,就有沟通的机会。的确如此,我的工作既要有力度,还得有温度,更要有深度。

去年夏天,我还在局办公室工作。一天午休时我起身去洗手间,楼道里隐约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蜷坐在办公室门口,楼道静悄悄,空荡荡,还有一丝闷热,越发显得这个身影的孱弱与孤独。

我走近一看,这不是老纪嘛。老纪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,十几年前丈夫、女儿因病相继离世,精神受了刺激,经常到公安局信访,说家人去世是有人谋杀害命,她骑着自行车十几公里往返于城里和乡下,执拗地坚持自己臆想出来的故事,有时她情绪激动,就吵吵几句,很多接待过她的局领导

也都很耐心地劝她、哄她,但她却始终也过不了心里的坎儿。

“大娘!”我已经走到了她的跟前,“怎么在这里坐着,来,到办公室坐会儿。”说着,我拉着她的胳膊,扶起她来,把她让进了办公室,扶着她坐下,烧水,沏茶,总之做了一遍正常接待程序,直到上班后,信访的同志把她领了下去。后来,又遇见几次她坐在楼道里,我都是对她热心接待,然后由信访科的同志把她领走。

我到派出所工作后,那天一早我开车刚进院,便听见一个又细又高的嗓门在吵吵,还带着一些歇斯底里的感觉,我定睛一看,这不是老纪吗?才想起来,她居住的村庄正是徐庄派出所的辖区。当时,我心里也挺没底,又该怎么劝她呢。

下了车,喊了一声:“大娘,你咋过来了?”然后就硬着头皮走了过去。

她看了看我,愣了一下,问道:“小伙子,你怎么在这儿?”

“噢?大娘你还记得我?”我惴惴不安地笑着,“哈,我刚来徐庄工作不久。”“那咋不记得,我到局里你对我可不赖哩!”她的情绪缓和了很多,说话的声调也降了下来。

这样,我心里就有底多了——她肯和我沟通。说着,我把她扶进了值班室,一番交流之后,老纪心里很满足,起身作了一个揖,推着自行车离开了。

望着她蹒跚的背影消失在胡同的尽头,我思索着前后的这些事情,对矛盾纠纷的化解有了新的体会——精神执拗的人往往讲道理讲不通,但他们也是懂得人情。

派出所的工作,尤其是农村派出所,所接触到的警情中,大部分是一些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,虽然不如刑警队和办公室的工作强度大,但像是乱麻一样,却还不能用刀刀斩,需要一点一点地理顺。有时媳妇也调侃我:“成天土里土气,养鸡喂狗,浪迹于田间地头,越来越没有志气了。”我笑着说:“我现在都成碎嘴子了。”

没错,我是一名基层党员,再大的志向也要从解决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做起,也要有苦口婆心的不厌其烦,现在面对的是农村百姓,就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志向与他们有关——这便是一种从警的情怀吧!正所谓,些小吾曹州县里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